

中国 情感文明变迁60年

——社会转型的视角

郭景萍／著

- 情感文明理论回溯
- 解放前中国情感文明状况掠影
- 中国第一次社会转型时期情感文明状况
- 情感文明建设：情感控制与情感赋权

中国情感文明变迁60年

——社会转型的视角

郭景建/著

责任编辑:李 惠 pphLh@126.com

封面设计:王玉浩

版式设计:雅思雅特

责任校对:史 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情感文明变迁 60 年——社会转型的视角/郭景萍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01-009356-7

I. ①中… II. ①郭… III. ①情感—研究—中国 IV. ①B84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0305 号

中国情感文明变迁 60 年

ZHONGGUO QINGGAN WENMING BIANQIAN 60NIAN

——社会转型的视角

郭景萍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4

字数:325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09356-7 定价:3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导 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09年,新中国走过了60年的历程。就新中国发展的根本标杆而言,主要是通过社会转型来体现。社会形态是解读社会历史的一面镜子;不同的社会形态构成了一面面不同的镜子。如果将情感文明看成是社会结构的一种重要精神形态,那么,情感文明以及作为其实践行为的情感生活,就必然要以社会的种种“镜像结构”之映照乃至作用才可能凸显出来。镜像中表现出来的情感文明现象,就像万花筒一样千变万化,并不是简单的机械再现。我们用一面面不同的镜子来观照中国情感文明60年的变迁,就会形成一幅幅不同的镜像。在社会转型的镜子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情感文明镜像尤为醒目。中国60年来的社会变迁中,先后经历了两次大的社会转型:第一次发生在1949到1978年;第二次则是从1978年一直延续至今。社会转型不仅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和文化的变迁,也影响中国人精神状态的转变,其中包括情感状态的变化。以往的一些研究,基本上着眼于阐述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的原因和意义以及取得的成就和社会效果,而对于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给人性、人际心理以及人的精神诸方面带来的社会影响很少探讨,至于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对人的情感结构、社会性格的形成以及社会情感风

气所带来的变化更是绝少涉及。我们认为,要理清、把握中国社会 60 年来发展的脉络、趋势和转变的契机,不能不探究中国人的情感世界、心态律动、心路历程。惠京伽(Huizinga)在观察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历史时曾说:“必须牢记情感、眼泪和精神剧变这些因素,以便完全地想象出那时期的生活是多么动荡和激烈。”^①情感是非常感性的,然而也是非常深刻的社会记忆力量,这种社会记忆对社会历史和未来具有再生产的意义。中国政治家要治国安邦,必须要善于承接和调整中国人情的社会结构,认真考察中国人情的历史和现实。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的行为受人性的支配,而情感是人性的最本原力量。“性”字结构由“心”与“生”合成。“心”如同有机万物一样,蓬勃地“生长”。情非外铄,人心本有。“情”内在于“性”,就像“性”内在于“心”一样。人情,说到底,是人性的外在表现;人情的变化,反映着人性在善、恶取向上的变化。正因为如此,古人形象地将性与情比作一株树的根和枝干,作为枝干的情是植根于性的,由根而生;虽则“部位不同,而本质则一”^②。具有人性力量的情感就会具有促成自然和社会的生机作用,使得自然和社会充满生气和活力。《周易详解》说:“天地之生万物,圣人之化天下,莫不皆有所感”,“情,天下万物之常理也。”《周易·咸卦》亦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在中国古人看来,“感”意味着天地相互交感、心灵相互和谐,绵延的自然与和平的社会就栖息在到处弥漫然而又是实实在在的情态之中。情态成为天地万物生长和人伦文化发展不可缺少的感应链条,情态所向即见

① 参见史华罗著,庄国土、丁隽译:《明清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心境词语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 页。

② 参见徐复观著:《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204 页。

自然和社会的归属,通过观察情感,则可知万物人伦之文明发展走向。中国人情是中国文明的土壤,人情变迁是文明变迁的基础。60年来中国人及其社会发生了无数改变,无论怎样变,终须回归人性的本原,回归作为万物之常理的情感。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状况总归要用社会化文明进程来解释。在中国文明史的坐标上,不仅纵贯着中国客观社会发展变迁的道路,而且交错着情感性的、精神性的、人性的发展轨迹。因此,为了比较学理化地描述中国人情感变化的发展轨迹,我们采用“情感文明”这个含义丰富且富有变化的术语。

关于情感文明,在我国学术界是一个很少使用因而也未被明确界定的概念。不过好在诸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意义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已经在中国普通大众的心目中深入人心,那么对情感文明的说法多少有些类似推理的接受和理解。当然情感文明有着特定的含义和意义,在西方思想文库中已经存贮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和交叉成果,本书专辟了章节对西方情感文明理论进行梳理和集成。关于中国情感文明和情感发展问题,在我国古代哲圣文人那里早已引起了足够的重视。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政治文化环境和人们认识的局限,情感文明并没有得到积极的探讨,在学界主流话语中没有相应的地位。情感文明的存在和变迁是普遍存在于所有国家和民族之中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实。当中国社会情感文明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吸取和激活西方和中国古代情感文明研究的成果,对中国现代社会情感文明变迁与发展作出本土化的探讨,从而通过积极有效的情感文明建设活动,用新的情感理念和情感实践方式促进中国社会和谐有序地发展。

情感依附于人,是存在于社会的主观现象,是一种主观的社

会事实^①。情感文明作为情感的集合表征,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意蕴,从灵魂的内涵推展到行为的方式变化,莫不具有情感文明的意味。对情感文明不能直观地笼统地加以描述,而必须视情感文明为变量,放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社会生活以及人的活动中来考察,这种考察依据一定的历史事件和文化资源。美国著名的研究情感的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尔斯特指出,情感最重要的来源存在于历史、人类学、小说和哲学中,“可以说,只有在此类更加广阔背景下,我们才能观察到自然状态的情感——它以其原始的驱动力蕴涵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中”^②。本书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60 年社会变迁的动态背景中,结合中国 60 年来能反映国人情感文明变化发展状况的社会事件、文献资料等客观事实或经验材料,来大致描述和解析中国人情感价值观念、情感行为的微妙而活性的变化以及对情感社会控制的变化过程。不过要完整无遗漏地描述中国人 60 年情感文明的发展历程是难以做到的。所以,本书主要从以下四个视点(也是考察情感文明的四个基本维度)对中国人情感文明的变化进行描述和分析:一是情感的社会经济视点,这主要关注情感文明形成和表现的社会经济原因及其动力。社会经济的变化构成社会变迁的关键环节,是社会变迁河流中翻滚的主流,也自然是情感文明变迁的社会基础。受社会经济影响形成的这种“情感”,是对社会情感文明状况变化的客观物质条件的生动反映,同时,“经济情感”(即反映经济的情感或投入经济的情感)本身是考察“情感文明”的一个重要变量。二是情感的社会道德视点,这主要关注情感文明的

① 参见郭景萍著:《情感社会学:理论·历史·现实》,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 47-52 页;亦见郭景萍著,《试析作为“主观社会现实”的情感——一种社会学的新阐释》,《社会科学研究》,2007 年第 3 期。

② 乔恩·埃尔斯特著,郭忠华、潘华凌译:《心灵的炼金术:理性与情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58 页。

人文道德素养。情感的道德发展状况往往通过公众的同情心、社会正义感和利他主义价值精神表现出来,“道德情感”反映了社会情感文明发展的善的方面及其水平。三是情感的社会审美视点,这主要关注以满足人本身的价值为最高境界的审美情感。审美活动赋予了情感以博爱、自由、崇高、优美等现代文明元素,美构成人性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审美情感的升华又成为改进和推动情感文明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四是情感的社会民主视点,这主要关注情感的社会控制状况和情感的平等状况。情感民主的舒展伸缩空间可以通过情感解放、情感自由、情感选择、情感权力等情感的活跃因子显示出来,“民主情感”反映了社会情感文明的开放程度。我们发现,上述从经济、道德、审美、民主这四个基本维度表现出来的中国情感文明的显著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由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经济震荡、政治权力博弈、文化观念波动往往会引起社会情感文明的关联变化。因此,我们对于新中国60年情感文明的发展轨迹的研究,主要以经济情感、道德情感、审美情感和民主情感这四方面的丰富内涵与形态之发展变化的四个视点为“横坐标”,而以两个重要时点的社会转型为“纵坐标”。两个重要时点分别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彪炳史册的历史时刻,标志着百余年来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最终获得了独立和解放,中国“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做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1978年,中国再次站到了历史的拐点上。当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春天的大门,这是改革开放的起点,中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①。

^① 参见人民日报国庆社论:《迎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2009年10月10日。

新中国成立 60 年,按照上述两个转折点分为两个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 29 年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31 年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简单地说,大致为两个 30 年。现在可以按照上述高度概括的视点与时点构成的坐标,对于新中国前后两个 30 年的情感文明化进程,做一番高度概括或曰简化的考察与比较。正如这两个 30 年的历史发展有很大差别一样,这两个时期的情感文明发展也有着不同的特点。头一个 30 年是以政治为中心、以国家为主体的时代,中国民众既有从旧中国的阶级压迫中获得情感解放的喜悦;也有陷入社会政治控制误区的痛苦;既形成了团结统一的集体主义革命情感,也存在有无视甚至抹杀个人情感自由的社会整合过度倾向;既激荡着敢想敢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也滥觞着庸俗不堪的非理性、盲目屈从的委琐与颓唐;既流行着勤俭节约、爱国爱家的道德情感风气,也弥漫着吝啬、患得患失的社会病态行为;既热衷于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人际情感关系,也滋生有相互防范、相互斗争的畸形人格特征。新中国“甲子”的后 30 年,社会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人为本的时代,政治革命场域被市场经济场域及其后来的网络文化场域所取代,这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中国情感文明的变化。总体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情感文明的变迁发生着以下一些关键性的变化:其一,中国人的情感生活方式由关注物质生活中的情感体验转向关注多层次多欲望的情感体验;其二,中国社会对情感的控制由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控制转向多元化的开放性调控;其三,中国人情感理念发生转型,即以自我实现为核心的情感生活开放理念取代以社会、家庭为中心的情感约束理念。在这三种主要的变化取向中,实质上反映着我国情感文明的经济取向、道德取向、审美取向和民主取向方面的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情感文明的上述变化是仅就主要趋向而言的,我们要看到两个30年之间的情感风气、情感气质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如果我们追溯两个时期的情感链条史,在第一个时期情感文明发展的好的方面或是负性方面到了第二个时期仍然有所表现。不过,作为中国社会发展新时期的情感文明现象有了突生的性质,两者之间不存在直线性递进的关系,而是转折性的发展和变化。在新时期,中国人情感文明的发展总体上是进步的,在改革开放的土壤上生长出一些在过去没有的新的情感现象和情感特征,例如,传统上对民众情感的激励主要靠空洞的政治口号和不现实的理想,现在注重通过实实在在的惠民政策使民众情感真正体会到幸福的感觉和树立乐观的精神;传统上对情感的控制主要靠政治高压手段和舆论压制,而现在主要依靠法律和道德的约束,法律控制是宽严相济的,道德约束也是通过教育自律为主。另外,在对情感的是非好坏的评价上也带有相对性,减少了强规范的硬约束,例如提倡要大公无私,但这只是一种价值要求,对重视个人利益的私情,不再采取在上面贴标签的做法,而是要看这种私情是否损害了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否则就承认其正当性与合情合理性。因此,中国情感文明的发展和进步的历史既是连续性的,也是间断性的,情感文明的变化发展是一个不断被生产、被建构的过程。另外,情感文明在发展历史过程中新生成的特征和功能并不意味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例如情感由社会控制向个体的自我控制发展是情感文明的一个新的发展特征和发展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情感约束已被情感开放所完全取代。事实上,情感的约束因素和开放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尤其在我国这样的外生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尤为明显。因为我国现代化的发展没有经过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民族素养尚未成熟,个人控制情感的能力素质较低。这种情况决定了我国可以通

过制定法律规范及其意识形态直接或间接的干预来调控社会情感,解决或缓解情感社会问题。社会的这些调控行为可以使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情感失控的可能性降至最低限度。尤其在我国的现代化的早、中期阶段民众情商能力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对情感的社会控制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人的情感相当多面,社会也会根据国情需要来通过各种手段调控情感。社会调控情感在任何时代都是社会维持秩序的需要,只是手段和形式会发生变化而已。个体对情感的自我约束不过是情感的社会控制规范内化为个体的情感行为规范的结果。社会情感文明的平衡和进步正是建立在情感的社会控制与情感的个人自律相互协调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的。

情感文明是社会变迁中的主观精神状态,那么它与社会经济、与政治变迁的关系如何呢? A. 巴洛齐齐曾概括了西方战后关于心理发展研究的三大学术取向(文化—个性学派、主流心理学、实用主义),这些研究中,有些研究将心理因素看做社会经济与政治变迁的前提条件(自变量),有些把心理因素看做社会经济条件与政治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伴生现象或干扰因素,有些把心理因素看做社会经济与政治变迁过程的后果(应变量)^①。上述研究取向虽然不同,但都强调了心理因素与社会经济、政治变迁之间是紧密联系的,把三种取向综合起来,恰恰说明两者之间联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受上述观点启发,我们在研究情感文明与社会经济政治变迁的关系时,为了避免陷入情感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的二元论对立的谬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成为我们研究的方法论。弗洛姆将心理因素视为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一种重要影响力量,认

^① A. 巴洛齐齐著:《发展的社会心理学分析》,转引自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718 页。

为如果忽视了它的作用就不能正确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人与社会的关系并不是静止不变的,社会在塑造人的过程的同时,人也在持续不断地创造社会。弗洛姆《逃避自由》一书是围绕人的社会心理因素而展开的。他认为要考察社会变迁过程,必须先剖析人的社会心理动态过程。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心理基础,这一心理基础就是现代人的性格结构,而现代人的性格结构又是现代人所处的特殊困境所造成的。我们坚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也就是既要看到社会对情感的建构作用,也要看到情感因素对社会的积极或消极作用,两方面不可偏废。

本书采用一种“历史·文化”的分析范式,力图把情感文明纳入历史发展过程中特定的文化时空内去分析,去认识。这里的“文化时空”由于是在“历史框架”之内的,是“过去时”的,因此,我们只能通过各种文化资料(包括文献资料,也包括媒介作品,如小说、电影等)来勾勒出一定的文化时空。文化资料所反映的现实具有社会历史属性。文化符号具有记忆储存情感的功能,能够在历史情感已经逝去的情况下,再现情感的基本风貌。除了梳理反映中国社会情感生活的史料之外,我们特别重视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这是因为,“文学作品特别适合呈现情感经验”^①。某个时期的经典文学作品不仅反映了社会的主流文化,也是该时代民众心理和情绪的反映。文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按照龙应台先生的看法就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情感只有在被表现时才能成为具体可感的社会事实。文学作品通过鲜活的文字、描述的画面微妙地表现了人们的世俗生活和人的情感,可以说,文学的最大特征就是情感表现主义。而且文学作品所描述的情感现象比

① 史华罗著,林舒俐、谢琰、孟琢译:《中国历史中的情感文化——对明清文献的跨学科文本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导言第4页。

起历史教科书来,更具有广泛性,更关注普通民众的情感生活,更能把人们深藏内敛的情感以形象感人的形式揭示出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想象”能够唤醒人们关心普通人、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同情心,唤醒人们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激情,从而塑造一种情感的“诗性正义”(poetic justice)^①。因此,对文学作品的考察,能够从某个侧面感受到情感文明的一种充满魅力的脉动。“历史—文化”分析范式在研究中国情感方面的杰出运用,应首推欧洲著名的汉学家史华罗(Paolo Santangelo)教授。他注重研究“情感的文化结构”,把情感看做是受特定社会中特殊文化影响的社会现象,强调情感必须通过丰富的语言表达出来,心境存在于语境之中。在这样一种理论框架的鼓舞下,史华罗教授认真地考究了明清文献典籍,尤其是这一时期的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和心境词汇,对这些生动的感性材料进行系统地梳理和归纳,借助文本分析和数据印证,建立了富有扩展性的五种复合情感的理想类型,通过结合明清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民俗风情,对中华帝国晚期中国情感文化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从而勾勒出特定语境中的具有历史原生态的中国人情感风貌,描述和重新建构一个特定时代的中国人情感生活。历史与文化的社会互动和变迁如何孕育和形塑了中国人情感文明的呢?史华罗教授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效,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本书遵循的基本方法论原则主要有:第一,主导性取向。由于社会结构发展的不平衡性,存在着主导性结构与非主导性结构的区别。受主导性社会结构因素影响的情感文明往往以活跃的形态显性地表现出来,而非主导性社会结构中滋生的情感文明

① 参见玛莎·努斯鲍姆著,丁晓东译:《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15—17、133—134页。

现象却被限制在有限的空间,表现不稳定且易于消失,这种情感文明的隐性表现实际上是一个不可知的黑箱。在研究中国某一具体时代的情感文明现象时,我们不可能充分地描述每一种情感文明现象,我们关注的是显著表现出来的与主导社会结构相一致的情感文明状况,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情感行为与态度进行研究和解释。第二,类型学思考。“情感文明”具有明显超越个体的和以社会整体为分析单位的特征,是弥漫在社会或社会群体中的情感道德风气、情感民主氛围和社会心态的综合表现。我们要遵循韦伯的理想类型的视角,撇开次要的、个别的情感现象,而针对社会上共同的、并具有代表性的情感类型进行研究。弗洛姆关于“社会性格”(即在一个共同的社会生活方式和基本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一个群体的大多数成员共同具有的性格结构和性格特征)的学说就是情感类型研究的杰出典范。这可以避免陷入木桶短板法则的陷阱,即使个别的情感现象很重要,但如果不具有代表性,就可忽略不计。社会情感文明虽然建立在个体情感的多样性与差异性统一的基础上,但不是个体情感的简单相加。类型学思考主要关心集体情感现象与社会变迁、社会转型的关系研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情感文明的社会整合特质。第三,历史向度,即将情感事物放在它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来进行研究,从中国历史变迁中各种社会事件、经济文化因素、社会政治冲突等内在机制和作用方式等来考察情感文明的变迁过程。通过历史给定参数的结构(经济、政治和文化机制),排除随机和偶然因素,以一种已经发生的社会事实框架和经验主义的实证分析方法对变迁的情感文明发展过程加以描述。

值得提及的是,随着第三次浪潮信息技术的发展,人工情感(Artificial Emotion, AE)也跻身于情感研究的前沿。这种研究以心理学、脑科学、认知科学、信息科学、人工智能等学科为理论基

础,利用信息科学的手段对人类情感过程进行模拟、识别和理解,使机器能够产生类人情感;另一方面,也使情感机器化。科学研究者已经提出了情感计算、感性工学、人工心理的概念,来研究人类的情感,包括研究情感识别、情感度量、情感理解、情感表达、情感生成、情感控制等内容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情感的人工化或数字化的研究带来了新视野和新方法。但这类研究的最大局限是忽视了情感的社会性。正如再精致的电脑也难以使它感性化一样,情感也难以纯粹数字化,中间似乎隔着一些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因为情感是属于人的,是真实发生在社会中的。如果忽略具体的情境和相对应的具体对象以及主体的情感价值理念,仅从二维或三维的情感图像和模式中识别情感,那么,就连“对敌人的仇恨”与“对亲人的生气”这两种在价值内涵上大相径庭的情感也会混为一谈。我们应该重视情感理论的本源——社会人的研究,必须结合社会过程、社会环境、活生生的人际互动来研究情感及情感文明的真实过程,这样才能把情感的研究建立在现实之中,不至于本末倒置。

撰写本书之目的,在于分析、研究揭示 1949 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情感观念、情感行为、情感生活的演变形态、表征特点以及其中蕴涵的文明意义,探寻 60 年来我国情感文明的社会变迁;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情感文明建设提出未来的设想和探索性的发展措施。本书对情感文明的内涵意义、情感文明的价值结构和基本维度进行了初步界定,对西方情感文明理论和中国传统情感文明思想作了梳理。对于所采用的历史材料,必须有个确定的范围,这样我们就面临一个历史分期问题。为体现社会转型的特点,我们大致将 60 年的历史首先分为两个大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以前时期(1949—1977),改革开放以后时期(1978—2009)。每一个大的时期又可分为不同的阶段。转型前

的社会与转型后的社会之间既有连续性又存在断裂。我国情感文明的发展也经历了交替盈蚀的过程。我们拟将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情感文明的变化情况作比较研究。

本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

1. 理论意义。“情感文明”表现为人类行为向着美、善、理性、优雅和秩序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形式，情感文明的这种以社会秩序为中心的演变趋向已成为社会学考察的一个基本研究。作为人类的自然存在和固有的人性因素，情感本身既受着社会文明的熏陶，同时也影响着社会文化和文明的发展进程。情感能够辐射出广泛的社会关系和生活内容，一切人生问题、社会关系都会在情感现象中得到反映；情感文明嵌入由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审美等基本因子构成的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可以通过人的情感行动产生能量使得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因此，对情感文明作理论的和实证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掌握社会学理论新的脉络，而且能够对人的情感作用于社会结构和变迁的机制提出一种合理的解释模型。探索情感文明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中的运行进程，可以具体而生动地再现社会文明发展的某个侧面，为了解中华文明展现独特的视角。中国是一个文明之国，也是一个情场化社会。本书探讨“情感文明”在中国 60 年的历史变迁，聚焦于中国人的情感生活经历，能够建立一种中国情感文明发展的谱系学。

2. 现实意义。从 1949 年到 2009 年的 60 年是中国历史发展最近、也是最重要的时期。内中的原因十分明显：一是由于中国历史在这里进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改朝换代，旧的社会制度被彻底推翻，新中国取而代之；二是这 60 年中国社会虽然变化曲折但发展非常迅速，特别是在 20 世纪末以后更是日新月异，这是由于社会进行了一次特别的重要转型，即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中国 60 年中发生的种种社会变化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形成冲击力量。而这一切,很自然地要折射到人的情感中。人的情感有其自由的能动性,但是必然受到历史与现实的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这种影响由于人的情感的浓厚价值性,因而往往表现出道德、审美、民主等“文明”气质方面的演变。情感文明的历史境遇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潮乃至社会风气的变异密不可分。社会转型及其每次社会变革都会带来情感思潮风起云涌,影响到社会的情感生活,也引起情感文明的或大或小的变革,这是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但是这一事实在我国学术界并没有受到普遍重视和研究。本研究立足于本土化的实证分析,从中国文化特色、当时政局的状况、社会思潮的特点、国人的道德变化、审美情味的差异着手,以情感文明的经济维度、道德维度、审美维度、民主维度等因素为切入点,对自 1949 年以来的中国情感文明变化状况进行综合考察和研究。通过考察国人的情感社会思潮和情感文明变化的复杂表现,试图勾勒出其流变形态和变化轨迹,分析其形成原因和影响因素,以期探寻其中蕴涵的文明意义以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作用。中国的社会背景、道德文化以及人际关系决定了中国情感文明将表现出什么样的发展路径?中国情感文明的历史变迁具有哪些特点?趋向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情感时代,我国情感文明建设面临哪些问题和发展机遇?本研究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中确立起来。因此,该研究对于了解中国人的情感文明生活史以及实现对现代情感生活方式的变革取舍,建设社会主义的情感文明,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的研究在我国还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其创新之处体现在:其一,在对中西方情感文明思想梳理的基础上,提出情感文明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架,以此作为理论支撑,运用社会学的文献—